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近两年,我发表了一些作品,如长篇小说《苦难山》、中篇小说《拷·问》《坑道里的冲锋号》《长津湖安魂曲》、短篇小说《赢艺》《生》等。这些小说多是写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历史的。之所以在革命战争历史题材领域花了不小的功夫,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当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脉络。这些战争具有革命性、现代性等多重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并且给当代留下了诸多历史性课题,让人们从中得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开创未来。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看待历史的眼光其实是当代的眼光,是当代决定着我们去看待历史。所以,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创作是一代又一代人持久地进行着的,每一代人的创作都有每一代人的特点,反映了他们所站立的时代的精神气质、美学面貌和问题意识。

我总会不自觉地从哲学层面思考战争的意义。在创作长篇小说《苦难山》的过程中,我在想,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当中的中国人来说,战争意味着什么?于是,我在《苦难山》的题记中写道:“战争是对命运的以死相争。你像犁子,把我的故土深深犁过。带来苦难,也带来希望……”我觉得战争对中国人来讲,就是拼死去改变苦难的命运,改变落后、屈辱、无力的命运。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目的最终达到了。

对于中国五千年历史来讲,战争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我思考的问题。《论语》里有句话:“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话让我心有所悟。智者为谁?仁者为谁?水代表着什么?山又代表着什么?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向度,理解了这两种不同向度,实际上也就理解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我在《苦难山》中借晚清举人刘鹤年老人之口说:“有智慧的人大多愿意向水学习,努力洞察历史潮流的走势,寻找历史大河中最有力量的一脉,然后顺势而为,上可做一世豪杰,下可保一生平安。而有大仁大义的人却更愿意向山学习。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对人生的执着。所以,他们更愿意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去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像山一样巍峨高大,足以让大江大河按照自己的理想向前奔流。他们尊重历史发展的大潮,但他们更有勇气为历史发展的大潮定立规则,并且不惜牺牲生命去践行心中的信仰。他们不惧苦难,哪怕那苦难像山一样沉重,他们也有胆量去推倒它,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山。”老人最后说:“所以,我认为当今中华更需要山一样的人物!”

这不失为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现代解释。我也倾向于认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战争更具有山的气质。也正因为如此,我把这个长篇小说起名为《苦难山》。《苦难山》写了兴安岭、大别山、南岭、钟山、上甘岭这五座山,写了树生小子、王大心、霓云、小美等若干个年轻人,历史跨度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这几场战争的历史意义是不同的。然而,贯穿全书的那种强烈的命运感是我特别看重并倾心营构的。

我觉得,命运感是一个人对国家与

山的魂魄与意象

■西元

民族命运的感同身受,以及个人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认同。中国人对命运感的体会大概格外刻骨铭心。比如,每个中国人大概都会接受一个耳熟能详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挨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挨打就是战争的失败,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与民族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民,意味着一个国家与民族被迫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细细想来,“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着实冷酷无情。它让人从中能够体会到,中国人在接受这个道理的同时,内心饱含着怎样的痛楚。可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这就是近现代以来一次次战争的残酷却无法回避的现实。应该说,这一道理深深影响了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只有理解了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也才能理解中国人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

在我的战争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占有相当的分量,如中短篇小说《死亡重奏》《无名连》《生》《坑道里的冲锋号》《长津湖安魂曲》等。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从情感上,都觉得那场战争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命运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文学作品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的话,那么我想,这种民族性格一定是反映在文学作品的气度上面。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字里行间体现出的精神、看待世界的眼光、面对

命运时的态度,还有美学上的追求,都属于文学作品的气度。

《苦难山》出版之后,我心里有不少懊悔,甚至是痛心疾首的地方。如果有些地方再花些时间处理打磨,恐怕效果会更好一些。后来,我也慢慢明白,看待长篇小说不是看它的小地方,而是拉开距离,看它整体性的东西。《苦难山》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好好去总结,以求在下一步的创作中有一个提高。可是那些整体性的东西其实代表着我这个年龄、思想能力、美学选择以及综合素养方面,所能达到的真实水平。这些整体性的东西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提高、能改变的。就像一个人试图拉着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法伪装的,伪装个几百字、几千字大概还可能,但伪装出一个长篇小说来,就几乎不可能了。如果看那些整体性的东西,《苦难山》还是表达出了一些我想要表达的内容。

在《苦难山》的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在“山”这个意象上有所领悟,有所突破。前面讲过,我曾经试着以“智者乐山,仁者乐山”为突破口,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山”的涵义。但仅仅如此还不够。我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几乎都是从山里面开始的。在大别山打游击的地方党组织领导者老何说:“别看现在红军弱小,可是有大山当咱们的家。红军是大山的孩子,是在自己家里。有了这个广阔无边的家,敌人就拿咱们没办法,也打不垮咱们。而且,早晚有一天,咱们会走出大山,成长为和大山一样强大的队伍!”在《苦难山》的结尾,小美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冥冥之中听到:“有个声音在响亮地说,‘他们才是山一样的人物!他们与苦难的大山搏斗过,现在,他们也成了山!’”

近现代中国的命运出自于苦难,又在与苦难的搏斗中凤凰涅槃。尽管我还远远没有把“山”的意蕴都挖掘出来,但我觉得我们民族性格里应该有这个东西。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反思的深度与力度决定着它自身所能达到的分量。小说《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生活与命运》和电影《炼狱》《斯大林格勒》都是让我深受震撼的作品。他们诞生在不同的时代,但表达出来的深爱与反思却同样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度。如果仅仅看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反思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应该理解其字里行间以至于融入血脉里的深爱。同理,如果仅仅感受到了其中的深爱而没有读懂反思的一面,也是不充分的。

在“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中,除了解决“不挨打”的问题,还要解决“不落后”的问题。如何解决“不落后”的问题呢?这就需要有力度和深度的反思了。其实,落后与挨打是一对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矛盾。历史的发展在于深切的反思,这种反思让我们更加明白当初坚持的是什么,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未来,我们要努力做些什么。

文艺评论

穿越密林(中国画)

程书同作

长征

第五六七九期



大历史与大时代

——关于散文集《大春秋》的笔谈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刘春荣:李舫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大春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是一部文化底蕴很深的散文集。诗词领跑,大气磅礴,且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作家在思辨理论之余绝不缺少激情和诗性;语言简约、短促、有力,金属般铿锵作响的文字铿锵耐读,有着豪放派诗词般的骨骼和质地。华丽的语言承载了充沛浓烈的情感,文字的机锋表呈出文章结构的匠心、人物内心世界的跌宕起伏。扎实的叙事能力和白描功夫使得作家得以重返历史现场,复现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通过对人物内心情感和命运的真切把握,传递出作家或悲悯、或体恤、或尊崇的同理与共情。

对于人物自身形象的把握,李舫是付出了极大热情的。作家笔下的扬雄,充盈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寥寥数笔,那个为写《长杨赋》耗尽心血、力竭而病的壮夫神态就跃然纸上;嵇康的出场笼罩着诗性甚或魔幻的气息,那种与时代和周遭格格不入的反抗者形象顷刻间便从读者的脑海里升腾而来。塑造好“士”的形象并拉近他们与读者的距离,李舫依凭的是对日常经验的复现和历史场景的重建。《大春秋》中,陈子昂不仅又一次登上了幽州台,更是将那一腔热血和忧郁也一并熔进了读者的内心。而李贺的出场,更是惊心动魄的。作者仿若亲身经历了那种生命撕裂的痛感,将一种决绝的力量和伤悼的哀婉一并刻录进生活的现场。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古老开篇,吟

唱讲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追索小康的朴素梦想。而今,穿越数千年风雨沧桑,这梦想在中国大地变为现实。《大春秋》是一份历史笔记,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碰撞、精神对话,是一场文化盛宴,也是大国文脉的现实律动。

全书最后以“苟利国家生死以”作结,显示出作家对“道”之大者的深切思考和自觉认同。这种基于历史警醒、文化省察、哲学思辨之上的梳理和总结颇具匠心,既点明了《大春秋》在文本层面的意旨,也彰显了以文学方式抒写和阐释历史的价值。在历史学家不能及、无所及之处,作品让历史的细节释放出更加个性、丰盈、壮美的美学力量。这种对历史的回溯、探寻、想象和思辨,展现出了新时代中国学者、作家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开阔胸襟和历史担当;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哲学内涵,又充满新时代表气,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

郑茂琦:《大春秋》中的“春秋”为何意?李舫说,春秋有很多种内涵,比如:春秋笔法、春秋秩序、春秋鼎盛……“春去秋来,四季轮回,成就中华五千年的浩浩汤汤。”在书中,她以23首经典诗词连缀起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清,及至现代和当下中国的宏阔历史。理想之崇高、英雄之精魂、家国之情怀,都隐含在诗词的吟咏和文章的写意中。

李舫的视角不拘泥于一时一地,思辨也不停留在一人一事,而是汇通古今中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将中国和世界历史巧妙地联系起来。发诸笔端的是对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充分自信。

在《大春秋》中,作家力求挖掘贯通古今的历史文化意蕴。因此,她将自己

张扬革命精神的力量

■李云

鲜活地再现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补精神之钙,增信念之氧,加信心之油,是作家们责无旁贷的使命。而电影就是最为立体、形象、直观的艺术形式之一。

我选择写电影剧本,写红色的主旋律电影,就是想让红色文化赓续永存,让红色基因能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我想为那些有名或无名的革命者立传,想让他们高贵的灵魂再一次浮升于未经硝烟的人的瞳孔里,让革命者的精神复活,以另一种形式雀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让他们不朽的事迹给今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支撑。

近年来,我多次深入大别山的金寨、霍山,皖南的旌德、泾县,淮南寿县以及淮北宿州等地,寻访老红军的后人、八路军

的讲述延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及至新时代扶贫攻坚的千古伟业。书中收录了李舫近年来在中国农村行走的纪实性随笔。从雪域高原的西昌、悬崖峭壁的凉山到武陵河畔的湘西、七省通衢的襄阳,那些亲历和见闻让人看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来路,进而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勾连起来。

在革命历史的书写中,《澄音——百年中共与北大红楼》用一个又一个与红楼有关的场景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初的风云变幻,让人感受到那一辈青年革命者沸腾的热血、激荡的青春、昂扬的斗志与坚定的信念。“亿万万人家国,一百余年拼搏”。李舫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明白,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国。”在《山河血》中,她为杨靖宇将军画了一幅小像,以文学的想象为历史补白,用“心灵的温润剥开历史的粗粝”。“东北的冬天滴水成冰,异常寒冷。他已经病的五天,高烧,咳嗽,胸闷,头昏欲裂,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双脚早已冻伤,肿得像两个石锤,右臂还有一处枪伤,他将衣服撕成布条扎紧,血终于止住了……他用残余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不能睡,不能死,我要站起来,我要战斗!”这就是对杨靖宇的书写,文字的“眉宇”间,透出凛然英雄气。春与秋其序,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抛洒热血、勇敢牺牲的精神,赓续不绝。

李舫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紧紧相连。这一革命历史所蕴含的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春秋》的叙事具有鲜明的总体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

短篇小说之美

■南翔

悉时脉搏、警醒世道人心、呈现精神内涵等方面,有嚼头的短篇小说当得起“轻骑兵”的美誉。

我写短篇小说,一是在乎历史感。那些以某些渐行渐远的历史年代、事件为选材的小说,因其容纳了鲜明而浑厚的历史意识,较能彰显作品的深度。

我曾经做过一个自剖式的文学讲座,题目:“文学创作的三个打通”。所谓“三个打通”就是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主要是虚构作品中掺入非虚构成分),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小说集《伯爵猫》(作家出版社2021年12月)中,《曹铁匠的小尖刀》就是一个虚构与非虚构打通的例子。为了写作《打镰刀》这个中篇小说(此中篇刊发于2020年第8期《中国作家》),我被一位朋友带去他老家四川渠县,见到他一位在老家打铁数十年的初中同学,融入了在铁匠铺采集的素材与感受。历史与现实打通的作品则更多,可见《疑心》《乌鸦》《苦楝豆腐》等篇。

集子中的《回乡》原发《人民文学》,为《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多种刊物、年选转载,收入,也曾提名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此小说便有大我的原型。大舅在改革开放之后还乡省亲,其间世事沧桑,人事稍留,居然也能安放在一篇万字短篇小说之中。

二曰,在场感。无疑,每个人都是自己经历的在场者。岁月如轮,一代又一代很快都上升为兼具并识历史和当下的见证者。身为作者,对于一些不曾

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单纯借助于史料,与“我”在现场,感受是不一样的。故而这种在场的写作,年龄和经历参差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不至于千人一面。

三日,美感。我曾在大学的课堂回答“何谓好文学”。一言以蔽之,三大信息量:丰盈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和创新的审美信息量。

如果把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比喻成文学的血肉,那么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就是文学的灵魂。思想力是当代小说充满淋漓元气的重要指征,它关联更多的可能性和意义。

创新的审美信息量既包括题材、形式、结构,也关乎对话、叙述以及修辞。

《痛点》写了一个舞者截肢之后的实有之痛与虚有之痛,而后高蹈的精神才是生命支点。《钟表匠》一笔一笔地晕现出一对老人间的友谊,收束之尾,钟表匠收藏室里,所有的时钟倒转。出人意表的构思,才能形塑小说强大的张力。好些读者朋友表示,我小说的语言,嚼有余味。我却想到,过分讲究语言,会否露出匠气?虽有这种顾虑,然而我在创作小说之时,仍然以经营语言为关键要素。

李白有诗云:“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不还”的不仅有青春,还有文字、情感、寄寓。只要汨流过,纵是不还,又如何!身为作家,只要作品能在读者眼中映现出些许共鸣与共情的波影光斑,我也就知足了。